

《哈迪与伯德：最后的时光》中的“底层历史”叙事及其伦理意义

The Narrative of “History from Below” and Its Ethical Significance in *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项煜杰 (Xiang Yujie) 汤轶丽 (Tang Yili)

内容摘要：作为历史上首位二度获得布克奖的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凯尔曼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对苏格兰底层人民的关注而著称。在《哈迪与伯德：最后的时光》中，凯尔曼以1820年的邦尼穆尔之战为背景，通过明暗线交织的叙事结构呈现了苏格兰普通工人的困境和挣扎。本文通过分析作品中邦尼穆尔之战的叙事再现，对处于底层社会环境中哈迪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进行解剖，尤其分析其伦理选择的过程及动机，从而解读以哈迪为代表的苏格兰人身份认同危机。本文认为，凯尔曼的“底层历史”叙事不仅赋予作品以苏格兰民族特色，确立了其艺术创作的个性，同时也在历史书写中注入深刻的伦理寓意，展现了凯尔曼超越地域性的伦理思考。

关键词：《哈迪与伯德：最后的时光》；文学伦理学批评；底层历史；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项煜杰，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叙事学和詹姆斯·凯尔曼研究；汤轶丽，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文学、叙事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Narrative of “History from Below” and Its Ethical Significance in *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Abstract: James Kelman, the first Scottish author in history to win this award twice, is renowned for his distinct language style and his focus on Scotland's underclass. In *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Kelman skillfully intertwines narratives to illuminat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rdinary Scottish workers amidst the backdrop of the Battle of Bonnymuir in 1820.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Kelman's portrayal of the Battle of Bonnymuir and to explore the ethical identity and choices

of Hardy, a character navigating a socially disadvantaged milieu. Additionally, it delves into the motivations behind Hardy's ethical decisions, aiming to unravel the identity crisis experienced by the Scottish people. It argues that Kelman's approach of narrating "history from below" not only infuses his work with a distinct Scottish national character but also establishes the unique essence of his artistic expression. Furthermore, it embeds meaningful ethical reflections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showcasing Kelman's ethical contemplations that transcend local confines.

Keywords: *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from below;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Authors: Xiang Yujie is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e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narratology and James Kelman (Email: xyj920155734@sjtu.edu.cn). Tang Yili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 scholarship include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fiction, narrative theor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milkytang2008@sjtu.edu.cn).

2011年,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再度摘得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桂冠,成为历史上首位二度获此殊荣的苏格兰作家,被誉为“新苏格兰文艺复兴奠基人”(Hames 2)¹。凯尔曼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他擅长将英语与格拉斯哥工人阶层方言、俚语等混杂使用,因此其作品常被贴上“单调粗俗”、“无可读性”和“混乱”等标签(Pitchford 701)。然而,语言混杂性和不可读性恰恰显示了凯尔曼捍卫苏格兰文化的决心:“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归属于某种文学传统。它力证两件事:地方文化的合法性和捍卫该文化的权利”(Hames 53)。彼得·博克索尔(Peter Boxall)认为,凯尔曼的作品持续关注“处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被边缘化’的无助人群”(Boxall 123);大卫·阿奇博尔德(David Archibald)也敏锐地察觉到“底层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可构成凯尔曼的主要创作意图之一²。上述学者的观察可谓切中肯綮。纵观凯尔曼的创作生涯,他对“苏格兰底层历史”始终保持高度关切,以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赋予苏格兰社会中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人群以语言和存在的力量。

尽管评论者们已经洞察到了凯尔曼书写“苏格兰底层历史”的创作旨趣,但他们并未深入探讨“如何书写苏格兰底层历史”以及“底层历史叙事背后蕴含的伦理意义”这两个关键问题。作为苏格兰作家、文化和政治活动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参见 David Archibald, "Kelman's Drama,"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James Kelman*, edited by Scott Ham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66.

家，凯尔曼不仅通过语言等媒介巧妙地将苏格兰民族意识融入各种文本之中，而且以普世的伦理视角反观苏格兰底层历史，赋予作品超越文本本身的社会、文化以及伦理价值。鉴于此，本文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阐释框架，探究凯尔曼戏剧《哈迪与伯德：最后的时光》（*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1990）中的苏格兰底层历史叙事策略及其伦理意蕴。在这部作品中，凯尔曼以19世纪初的苏格兰为历史背景，通过展呈哈迪与伯德在底层历史境遇所面临的伦理身份困境表现人性的深层状态。本文通过分析邦尼穆尔之战的叙事再现，对处于动荡底层社会环境中哈迪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进行解剖，分析其伦理选择的过程及动机，从而解读以哈迪为代表的苏格兰人身份认同危机，为读者从伦理视角思考苏格兰历史提供启示。

一、邦尼穆尔之战的叙事再现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作品应被置于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环境中审视。¹ 伦理环境的概念为《哈迪与伯德》中的“底层历史”叙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解读框架。《哈迪与伯德》的序言部分介绍了作品的背景：“1820年，安德鲁·哈迪与约翰·伯德领导下的激进派团体与政府军发生了冲突，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邦尼穆尔之战”（109）²。深植于19世纪初苏格兰特定的历史土壤，作品中的苏格兰社会底层群体，如工人、农民等，组成的激进派对当时被地主阶级操控的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要求政治改革，渴望恢复议会。例如，当被斯莫尔长官问及恢复议会的原因时，伯德强调“议会的取消是导致苏格兰处于水深火热的真正原因”（159）。哈迪也提出“当他们问我想要什么权利的时候，我回答道：‘恢复议会’和投票选举。因为我认为苏格兰政府应该满足这些要求”（151）。哈迪和伯德坚信，被地主控制的苏格兰政府已长期漠视底层民众利益。二人希望通过抗争来恢复议会制度，实现社会的公正。尽管哈迪与伯德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他们的抗争精神和意识在苏格兰民族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此背景下，这场战役不仅是当时苏格兰社会政治动荡的缩影，更是工人阶级与地主阶级伦理观念对立与碰撞的生动写照。这种充满矛盾和冲突的战争伦理环境也在凯尔曼精湛的叙事技巧中得以呈现。

在《哈迪与伯德》中，凯尔曼构建了以哈迪与伯德对话为明线、以叙述者对战争的回忆为暗线的双重叙事结构，通过自由间接引语融合回忆者哈迪与叙述者视角。邦尼穆尔之战虽未以真实的战争场面呈现，但凯尔曼通过穿插叙述的手法，将战争所引发的混乱与恐慌的社会氛围巧妙地融入作品的叙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本文有关《哈迪与伯德：最后的时光》的引文均来自 James Kelman, *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90)。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事结构。在对话的主线中，凯尔曼运用格拉斯哥工人阶层独具特色的语言，通过哈迪、伯德等人物所使用的断裂、破碎化的语言表达方式，展现底层人物内心抗拒与屈从之间错综复杂的张力。他们的对话不仅揭示了其对政治改革的强烈渴望，更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反抗。这种直接而生动的对话交流，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到底层人物在动荡时期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的背景和情境。另一方面，叙述者的回忆则为故事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透过叙述者的回忆，读者可以窥见战争场景和人物内心世界的交织。这种叙述方式不仅丰富了故事的层次感，也为故事提供了一种自反性的视角，让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底层群体的处境和危机。《哈迪与伯德》中的双重叙事结构由此展现了19世纪20年代苏格兰社会中工人与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争议与对立。在这部作品中，邦尼穆尔之战不仅是一场硝烟弥漫的军事冲突，更是多重伦理观念、不同阶级利益和社会深层矛盾的集中体现。战争背后隐藏着苏格兰人民在历史转折点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道德选择。当时，经济衰退和严苛的《谷物法》（*Corn Laws*）¹让民众生活举步维艰，而邦尼穆尔之战的失利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的焦虑。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的伦理环境中，哈迪、伯德等人展现出了底层群体复杂的伦理身份。

二、“底层身份”的书信写作建构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的伦理问题产生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哈迪的伦理身份并非单一，而是由多重角色构成，蕴含着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出身于格拉斯哥南部，哈迪原本对政治活动并无多少兴趣。然而，1820年的邦尼穆尔之战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这场战役不仅加深了他与老兵伯德的深厚友情，更在团队协作中展现了他不凡的领导才能。然而，哈迪对于突然赋予的领导者身份却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甚至畏惧。即便在格拉斯哥民众的请愿队伍中，他也更倾向于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朴实善良的劳动者，心中都怀揣着回到昔日耕作快乐时光的梦想”（136）。尽管哈迪认为自己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也是代表着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反抗者，努力为底层群体争取应有的权益；但同时他还被迫拥有领导者的身份。这一身份隐含着与广大群众产生隔阂的风险，也置哈迪于身份困境之中。作为反抗者，他需要为劳动者发声，争取

1 1815年5月，曼切斯特政府为保护部分地主利益不受侵犯开始禁止殖民地以外的外国谷物（小麦、大麦）进口，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谷物法》。该法律一经发布，导致苏格兰出现资源垄断、粮价上涨等现象。许多苏格兰工人因无法接受高昂的价格被迫面临饥饿。哈迪、伯德二人呼吁政府废除《谷物法》。参见 Harley Knick, “Trade: Discovery, Merchantilism and Technology,”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Roderick Floud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5-203.

权益；但作为领导者，他可能因地位的提升而与普通劳动者产生距离，甚至需要在某些情况下牺牲劳动者的利益。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使得哈迪面临着艰难的伦理选择：他应该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底层身份”？对于哈迪而言，他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劳动者代表，就必须警惕领导者身份与“底层身份”的背离，并始终贯彻反抗者的精神。这不仅意味着他需要在行动上保持与劳动者的紧密联系，更需要通过文学书写等方式，持续地传达和捍卫劳动者的声音与利益。因此，哈迪的伦理身份并非简单的劳动者，而是反抗者与领导者的复合体。他需要在这两种身份中寻找平衡，努力做出最符合劳动者利益的伦理选择。

“文学批评要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采用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不同时代伦理环境下人物做出的伦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9）。作为劳动者，哈迪的伦理身份为他的叙述赋予了强烈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在历史的大潮中，哈迪不仅是见证者，更是一名积极的行动者。“1820年，近6万名工人发出行动的呼声，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图夺取苏格兰当地政府的武器，但均未成功。安德鲁·哈迪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这群人的领袖，与曼彻斯特政府的骑兵形成了紧张的僵持局面。不同政治阵营之间的斗争日益白热化”（Devine and Wormald 439）。19世纪20年代的苏格兰是政治思潮的交汇点，身处这一时代的哈迪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果断地选择通过文学来记录自己的伦理选择，并对这个纷扰与变迁的时代进行深入反思。哈迪通过文字揭露社会的不公，为民众发声。他尝试通过书信的形式来记录19世纪初苏格兰工人所面临的集体困境。在剧中第一幕第一场景中，“哈迪坐在茶柜前，专心致志地写信”（110）。他朗读者：“我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写信来反省我过去的行为，希望我过去的行为会因我们神圣的救世主的功绩而得到宽恕”（111）。在哈迪的视野中，文学书写不仅是一种表达观点的方式，更是一种完成伦理选择、实现自我反思的手段。这种对过往行为的持续审视，为其人性因子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书信写作也由此建构了他的“底层身份”。除此之外，哈迪对自己的信件寄予深厚期望。他希望通过书写邦尼穆尔桥上的事件来实现他为民发声的夙愿。在第一幕第十三场景中，他写道：“下面是邦尼穆尔之战的全部过程，希望读者能够忽略其中夹杂的私人情感，也不要考虑这封信的写作方式和风格”（148）。随后，哈迪撰写了自己与政府军相遇的具体细节：

伯德原本以为会有两百名全副武装的老兵赶来支援，但结果却只有五六个人。不过，如果我们从格拉斯哥来的人更多一些，情况或许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穿越邦尼布里奇，迎接从斯特拉文、卢瑟格伦等地赶来的援军。我们经过一座沟渠桥，踏足于沼地上约一英里远的地方，随后登上山顶，休整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在这时，骑兵出现了

并要求我们放下手中的长矛，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然后，我们被带到了斯特林城堡被关押。（149）

哈迪在历史的长河中赋予了邦尼布里奇、斯特拉文、卢瑟格伦等苏格兰地理坐标深远的意义，以此铭记这段“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历史”（110）。他不仅以书信的形式详细记录了19世纪初苏格兰工农阶级的斗争史诗，更是通过文字传达出他对社会公正与道德责任的深沉执着。在戏剧的第二幕第五场中，哈迪曾满怀深情地对妻子玛格内特说：“在这封信抵达你手中之前，我的精神将永远陪伴着你”（173）。在幻想中与玛格内特对话的同时，哈迪将自己的书信视为一种艺术表达。尽管他的朋友伯德提醒他：“你不必给每个人都写信”（175），但哈迪坚定地回应：“我必须继续写这些信，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175）。哈迪之所以如此坚持，源于他强烈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他坚信苏格兰民众的利益至关重要，“人民反抗压迫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165）。因此，他选择通过文学书写来传递自己的伦理观念。在整个戏剧中，哈迪奋笔疾书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直到故事结尾：“哈迪停下了笔，凝视着天花板，缓缓地闭上了眼睛”（180）。通过文学书写，哈迪不仅对自己进行了道德剖析与自省，更引领读者一同感受他对战争的困惑，以及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哈迪的文学书写不仅记录历史事件，更成为了为底层劳动者树立自我认同的象征。他通过挖掘并呈现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和挣扎，巩固了他们的社会身份。通过叙述邦尼穆尔之战和劳动者运动，哈迪为底层劳动者的历史和价值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的文字为他们赋予了声音和存在感，使得他们不再是被忽视的群体，而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哈迪的文字书写不仅是一种伦理选择，更是一种对底层劳动者身份的坚定建构和巩固。

三、“底层历史”书写背后的身份认同危机

哈迪复杂的“底层身份”书写映照了他从身份困惑走向自我救赎的曲折过程。这也反映了19世纪初苏格兰政治混乱的社会景象：在战争冲击下，原有的伦理秩序与价值取向受到严重影响，人们普遍陷入了身份认同的迷失和伦理困境中。苏格兰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戏剧作品中尤为明显。马克·布朗（Mark Brown）在《1969年以来的现代主义与苏格兰戏剧：舞台革命》（*Modernism and Scottish Theatre Since 1969: A Revolution on Stage*, 2019）中指出，“自16世纪加尔文教限制苏格兰剧场上映一切有关历史的戏剧开始，戏剧事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然而，近五个世纪后革命历史剧的涌现，解决了困扰苏格兰人几个世纪的‘我是谁’的问题”（Mark Brown 31-32）。苏格兰剧作家主席伊恩·布朗（Ian Brown）也强调：“二战后，革命历史剧能够迅速成为苏格兰现代戏剧的主流，这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寻求身份认同的需求密

切相关”（Ian Brown 79）。两位学者都关注到了苏格兰人长期以来对于“我是谁”的身份困惑，以及戏剧在探寻和表达这种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凯尔曼接受了伊恩·布朗的邀请，对《哈迪与伯德》进行了再度改编¹，使得“苏格兰人身份认同”成为作品深入探讨的伦理问题之一。这也彰显了戏剧在反映和探讨社会伦理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和影响力。

“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困境不仅反映在个体层面，也体现在民族集体层面。1820年邦尼穆尔之战的根源就在于苏格兰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出现了裂痕。戏剧开篇引用诗人丹尼尔·泰勒（Daniel Taylor）的《伯德与哈迪之颂》（*The Dirge to Baird and Hardie*, 1889）解释道：“有关哈迪和伯德二人的过去，就像众多其他有关苏格兰起义的历史，几乎完全被人们所遗忘了”（109）。这里的“几乎完全被遗忘”揭示了伯德与哈迪的个人历史与苏格兰历史之间的裂痕，反映了苏格兰底层人民遭遇身份丧失、不被认同的困境。19世纪20年代的苏格兰更是历经了诉求被排斥甚至被打压的命运。自19世纪以来，苏格兰接连爆发的独立运动常被英国官方描绘成联邦中的激进形象，这反映了苏格兰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屡遭挫折。在这种环境下，苏格兰作家们对邦尼穆尔之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和再现²，以不同方式凸显了苏格兰人在身份认同上所遭遇的困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道德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伦理表达方式。³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创作者，凯尔曼努力将苏格兰社会边缘人物纳入创作，以此揭示这些人由于身份认同错位所造成的困境。他打破了传统文学中苏格兰工人的“进步者”形象，即“经

1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格兰文学界逐渐聚焦于历史事件的伦理内涵，并由此兴起了一种反抗权威的“进步主义”思想潮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格拉斯哥学派，以凯尔曼、汤姆·雷昂纳德（Tom Leonard）和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为代表，坚信只有深入剖析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未来。秉持这样的历史观念，凯尔曼创作了《哈迪与伯德：最后的时光》，这部作品的核心目的正是深入探索历史事件的伦理价值。参见 Simon Kovesi, *James Kelman*, Lond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22.

2 有关1820年苏格兰邦尼穆尔之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并非凯尔曼首次创作，历史上先后进行了三次改编。首次为安德鲁·哈迪的后代科尔·哈迪（Keir Hardie）以笔名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于1908年创作的《苏格兰自由斗士》（*Fighters for Freedom in Scotland*），其次为1920年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弗兰克·雪莱（Frank Shelley）选择以《苏格兰自由斗士》为蓝本，改编创作了《1820年之崛起》（*The Rising of 1820*），第三次则为1990年凯尔曼在面临格拉斯哥市“欧洲文化之都”更名事件进行了再次创作。参见 Simon Kovesi, *James Kelman*, Lond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27-128.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0.

个人努力摆脱生存困境”（Craig 105）的固有模式，突出描述了作为失败者的苏格兰工人形象。在《哈迪与伯德》中，主人公们为帮助格拉斯哥市民摆脱贫穷和饥饿的命运，勇敢地放弃了原有的身份，但却陷入了无法改变周围环境的困境。这种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挫折，更是对苏格兰人集体面临的伦理、身份和归属问题的深刻反映。通过对哈迪、伯德等主人公失败故事的书写，凯尔曼引导读者思考个体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定义自己，如何面对身份认同的挑战。这种书写方式不仅展示了苏格兰工农阶级的悲剧故事，更引发了关于如何重建伦理环境、做出伦理选择以实现身份认同的深入讨论。鉴于此，《哈迪与伯德》的底层历史书写探讨了苏格兰人集体面临的伦理、身份和归属问题，成功地引发了读者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实现了其文学和伦理价值的双重提升。

在《哈迪与伯德》中，凯尔曼不拘于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模式，以明暗交织的叙事穿梭于分裂战乱的城市及矛盾不安的内心之间，深刻揭示了苏格兰底层工人在战场等“极端”环境中所经历的身份认同和伦理选择的挑战。凯尔曼通过深入挖掘战争中的人性挣扎，展现了对伦理问题的深刻洞察。他聚焦于人物内心的世界，而非过多陷入历史的细节之中，让读者直接感受到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困境。这种叙事方式不仅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凯尔曼式”苏格兰民族特色，确立了其艺术创作的个性，同时也在历史书写中注入了深刻的伦理寓意，展现了凯尔曼超越地域性的道德思考。即使两个世纪过去了，这部作品依然传递着深刻的警示，发人深省。以《哈迪与伯德》为代表的苏格兰本土作品在后现代思潮中大胆探索，突破了传统束缚，展现了独特的“苏格兰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通过对普世人类道德问题的深入探讨，拓展了苏格兰文学对现实的深度书写。

Works Cited

- Archibald, David. "Kelman's Drama."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James Kelman*, edited by Scott Hame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0. 65-71.
- Boxall, Peter. *Twenty-First-Century Fic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 Brown, Ian. *Scottish Theatre: Diversity, Language, Continuity*. Amsterdam: Rodopi, 2013.
- Brown, Mark. "An Historical Note." *Modernism and Scottish Theatre Since 1969: An Revolution on Stage*, edited by Mark Brow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30-37.
- Craig, Cairns. "Resisting Arrest: James Kelman." *The Scottish Novel Since the Seventies*, edited by Gavin Wallace and Randall Stevenso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1993. 99-114.
- Devine, Thomas Martin and Jenny Wormal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Scottish History*. Oxford: Oxford UP, 2012.
- Floud, Roderick et al,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Hames, Scott.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James Kelma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0.

Kelman, James. *Hardie and Baird: The Last Day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91.

Knick, Harley. "Trade: Discovery, Merchantilism and Technology."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Roderick Floud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Kovesi, Simon. *James Kelma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Pitchford, Nicola. "How Late It Was for England: James Kelman's Scottish Booker Priz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1 (2000): 693-72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松林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Simon Kovesi, *James Kelman*, London: Manchester UP, 127-128.